

曾卓研究文选

崖边听笛人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曾
卓
研
究
文
选

崖边听笛人

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崖边听笛人:曾卓研究文选/曾卓等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1.7

ISBN 7-5354-2224-1

I.崖…

II.曾…

III.曾卓-诗歌研究

IV.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1351 号

责任编辑:韩敏 责任校对:邓常琪

封面设计:贺凯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9.25 插页:4

版次: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430 千字

I·1697 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○ 绿 原

“最幸福的人”

代 序

时间有时并不重要，天气似乎更能帮助记忆。1941年冬天，重庆没有雪，只有雾。我收到邹荻帆的一封信，约我参加一个诗歌座谈会，并说读了冀汭向他推荐的我的一篇习作《雾季》，将发在他和姚奔、曾卓、冀汭等人主编的《诗垦地》丛刊第一期上。没有参加过任何社会活动的我，因此喜出望外，按期换了一身新衣服，从郊区赶到市内去赴会。到会的都是些著名的和不很著名的诗人，其中除了邹、冀二位，还有两个当时才认识、却从此保持亲密往还一辈子的友人，一个是六十年代故世的诗人阿垅（这时他署名 S. M.），另一个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曾卓。诗人曾卓作为《诗垦地》发刊座谈会的召集人之一，这时左手捏着黑色曲柄大烟斗，右手晃动着，正在纵谈当前诗歌运动的形势和任务，记得还对某教授的“反‘差不多’”论提出了委婉的批评。他发笔、成名较早，口才、知识及政治水平均非我所能及，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比我不过大半岁。

那时我在一家钢铁公司当练习生，获帆兄鼓励我辞职，报考他所在的复旦大学（抗战时期的复旦大学在重庆北碚黄桷镇）。就这样，我开始同“诗垦地”诸君子团结在一起了。曾卓当时在复旦教务处当一名职工，不久又到江对岸北碚一家剧团当导演，有一段时间他同获帆和我几乎可说朝夕相处。我们几个除了诗，没有任何追求或牵挂，又都是没有家的流亡青年，只要谈得来，很容易比亲兄弟还亲热。韩愈的两句诗，“诗成有共赋，酒熟无孤斟”，正好形容我们当时的精神生活。获帆比我们年长几岁，是当然的老大哥，而曾卓和我真可谓一见如故，很快亲自证实了爱默生的名言：“朋友就是你可以在他面前大声思想的人。”什么叫“大声思想”？不就是“有话就说”、“无话不谈”么？这点意思还套出了我的另一句：“朋友就是我的破口袋，什么寒碜家私都可往里塞。”为了纪念我们那一段友谊，他曾经写过一篇短文——短文题名《友情底路碑》，“而我们当时结识还不到半年。我们同岁，又是小同乡，初见面就亲热无比，坦诚相见。当时只能算是友情的起点，其后的五十多年，在时代的风雨和各自的坎坷生涯中，一步一步烙下了我们友情的足迹……”（引自曾卓：《绿原的一首佚诗》，收《听那美丽的笛声》）

至今整整六十年，不论就年龄、思想、感情等主观因素来说，还是就环境、遭遇以及各自或共同承受的“灾祸”等客观因素来说，每个人都不能不说是“饱经沧桑”了。但是，我和曾卓的友情的纯度和浓度，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奇怪，实在是一点变化也没有。四十年代头几年，像刚才所说，我们在北碚相处过一段日子；不久他考进中央大学，校址柏溪也在嘉陵江沿岸，1944年我为了躲避白色恐怖，还到他那儿去住过半个月。抗战胜利后，我们同居武汉，虽说各自成家，仍旧过从甚密，这时他介绍我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，并和我一起迎接了朝思暮想的全国大解放。此外，1944年我离开了重庆，1953年离开了武汉，我和他一直保持着通信联

系，其密切与充实程度也没有受到空间距离的任何影响。由于无话不谈，也就离不开当时文艺界的是是非非，到了1955年，我们当时的那些信自然成为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被搜查的“密信”的一部分。

1955年前几年，除了保持通信联系，我们很难再有机会相聚了。只记得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期间，他作为武汉市代表来过一次北京，我们为胡风当时日见紧张的政治处境谈了很久，我并引他去见过一次胡风。事过境迁之后，他不无感慨地说道，他虽然和胡风只有那么一点“简单的交往”，却“几乎影响了我一生”，以至“新文学史研究者，将我也看作是‘七月派’的一个成员。我并没有在胡风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东西。但从诗的战斗方向上说，从诗的总的风格上说，是可以这样看的吧。至于就我个人说，我是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的，‘七月派’诗人又大都是我尊敬的友人，我乐于和他们站在一起。”这是曾卓在1992年写的一篇纪念文章里的话。联系到他1952年对奉命到北京为胡风“开刀”而路过武汉的舒芜说，“如果你自己真地那么认为，那你就那么说，那么写。但你不要把别人牵扯进去。”（引自李辉：《胡风集团冤案始末》）——在这位老朋友身上，我深深体会到“疾风知劲草”这句古谚的含义：原来他这个人和他的这几番话，不论是在当年尖锐斗争的激流中，还是在今天有人悔恨受过胡风的栽培、耻于跟“七月派”沾边的太平世界，都是称得上光明磊落的。

到八十年代，胡风案件平反以后，我们阔别了四分之一世纪，虽然仍未能住在一个城市里，聚晤的机会却比过去多多了。首先，他能经常到北京来，无论他有何公干，获帆和我都会设法聊尽地主之谊，充分领略洋溢在他的爽朗笑声中的我们大家多年罕见的愉快情绪。特别应当提到的是，他劫后第一次重来北京，听说路翎就住在芳草地，却不知道门牌号码，便硬拿出宝贵的一天，亲自到那片贫民区，挨家挨户到处打听，终于把那个迷失者从人海中找了出

来。有人问过路翎，平反以后，他最先见到的朋友是谁，尽管他精神分裂，却总会明确地回答：“是曾卓！”再提一件事，1986年元月16日，胡风追悼会次日，二十几个前“分子”聚会在梅志先生家里，曾卓在有人说胡风有“忠君思想”之后，接着这样说：“胡风本质上是一个诗人，也是一个天才的理论家，有很了不起的艺术敏感性。同时，他对党、对共产主义忠心耿耿。但是，他不像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得那样深刻，只有诗人的激情，又不懂政治，不懂权术，情绪上有时对某些人过于偏爱。这样，不必要地得罪了一些人。”（引自前书）——我所以提到这两件事，一是想说明曾卓对朋友的真诚，二是想说明他的知人论事的水平和分寸，为不少同代人所不及。

此后，我们还一起到惠州、深圳、桂林等地开过会。他还请荻帆和我参加过黄鹤楼诗会；冀沅还请大家（除了邹、曾、绿，还有化铁、罗洛、罗飞）游览过千岛湖；冀沅夫妇还通过关系，邀请曾卓夫妇、何满子夫妇，以及荻帆和我，一齐游过白鹿洞和庐山。这些都是我们虽然年近古稀、身体还算健旺时的乐事，也是只剩下一些张冠李戴的片断记忆的往事了。到了晚年，故人星散如昔，有时不免触及无常的阴影。荻帆走了六七年，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经常困扰着我和老伴的记忆；冀沅久病成良医，居然几次跨过心肌梗塞的危机，坚持凭借惊人的记忆，写出了不少宝贵的回忆录；曾卓也有病在身，在电话和书信中却仍然谈笑风生，让人跟他一样乐观——就在二十世纪末年，我们还相约出门游山玩水两次。他和我的这两次出游，不论从心理角度还是生理角度来看，都是难以置信的，更是令我难忘的。一次是2000年5月28日到6月2日，我从北京去武汉，偕同他们夫妇，乘火车到十堰市，造访新华书店黄成勇经理，由黄经理和《书友》报主编胡荣茂先生导游，算是参拜了一次慕名已久的武当山；另一次是同年8月18日到23日，我和老伴应著名新诗人萌萌（曾卓的大女儿）诚邀，到海口市与曾卓夫妇相

聚，在大海的涛声中和南国的浓荫下，无拘无束地畅谈了几天。值得提一下的是给我印象较深的三件事：一、在武当山，乘缆车到“一柱擎天”之后，养病的“曾老”居然跟大伙儿一起爬到了“铜殿”，并坚持要爬迂回九曲的“九连蹬”到“金殿”去；经大家反复劝说，他才同意和胡先生一起在“转运殿”休息，但仍认真拜托继续上爬的香客们，一定把他虔诚的“心”带上去，好向久经风雨雷电的“大顶”致敬。二、在海口的海边，那时已是黄昏，海浪向站满人的海滩涌进一步又退去，退去了又涌进一步，似乎非把整个海滩淹没掉不可……大家正凝神思索大自然的奥秘之际，不服老的“曾老”竟一下子脱掉外衣，露出泳装，迎着海浪朝昏暗的远方游去……在大家惊惶的呼喊之下，他才缓缓转身游了回来，站在又一阵海浪前面，给大家一个湿淋淋的大笑。三、还是在海口，经萌萌安排，我们和海南大学的几位教授举行了两次 workshop 式的漫谈，题目是关于“七月派”及其悲剧，应当怎样重新向后人介绍。理论家曾卓就这个话题，做了一次精辟的发言，可以概括成“一线三点”四个字。“一线”是指贯穿全局的鲁迅精神。“三点”就是 1. 重现三四十年代整个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历史环境；2. 着重分析“七月派”作家艺术创新的方向及其未完成的过程；3. 将“七月派”的创作经验同当前文学创作成就加以比较。最后，他又叹息一声说道：“历史环境的重现，恐怕是很难很难了。”他最后的意思我以为是说，“七月派”的历史贡献是同当时具体的时空环境相联系的，离开那个感性环境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推断，容易产生隔靴搔痒的偏差。何况当年的过来人一天天在少下去，所以他感到“很难很难”。曾卓似乎漫不经心的几句话，如果我转述得不太离谱，未尝不可以供当今文学史家们参考。

曾卓是一位诗人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他少年时期的《母亲》、《门》，复出时期的《悬崖边的树》、《有赠》，晚年的《我遥望》、《老水手》等等名篇，都可看作特定历史风貌的铜雕而流传下去，

这里不多说了。我想着重说一下的是，他多次对我说过，诗人们一般不太注意他们的散文，这是他们的弱点，也是令人感到惋惜的。事实上，曾卓不仅是一位诗人，他更是诗人中间少见的散文高手。他的散文除了清丽、婉约、为青年读者所喜爱的一面，有时更显得苍劲、老练、简洁、沉着，来自一般诗人未尝接触到的另一路数，看不出（也不需要）对他的诗才的任何借重。他的散文领域是广阔的，不限于讲究柔美的抒情文字，更包括冷峻的讽刺性的短篇小说（如反映抗战前的白色恐怖的《一个春天的夜晚》），深入浅出的理论文章（如1954年胡风文艺思想批判期间他不得不写的一篇表态性稿件，就是以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为例，阐释作家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统一性的，至今看来仍颇有参考价值，虽然当时并没有产生作者所希望的政治效果），以及可以上演的剧本（如平反以前不能署名所写的《江姐》）。附带说一句，他不仅是剧作家，还具有演员和导演的实践经验。但是，作为多面手，曾卓的表现不仅在写作上，他同时对生活更有广泛的爱好，如游泳、打球、下棋、跳舞等体育活动，他无一不会，虽然未必样样皆精，却证明了他生活中自我开发的主观能动性。

由此想到，曾卓在朋友中间一向以“福将”的浑名著称。所谓“福将”，不是说他在人生战斗中一帆风顺，而是说他有广泛的人缘作支援，面对任何艰难险阻，都能无所畏惧。在八十大寿的纪念会上，他动情地说过：“正如一个朋友说的，获得爱比获得权力、金钱、荣誉更难得。因此，我是一个最幸福的人”。是的，他从人间获得了许多爱，本书的作者如此之多，大都是他的朋友和读者，就证明了这一点。但是，他所以能够获得这许多爱，又是由于他同时或者首先爱人、爱许多人的缘故。这并非意味着他对人没有观察力和分辨力，而是说即使对于不十分合拍的人，他也照样可以说说笑笑，并能让对方也乐于和他说说笑笑；这也并不表示他世故，他懂什么交际术，他善于隐瞒感情等等，恰恰相反，这是由于他本性

真诚，能真诚地显现自己的真诚。因此，他爱人，也被人爱；他爱很多人，也被很多人爱。他说得对，他是“一个最幸福的人”。

绿原，2001年6月16日，北京八里庄

○ 曾 卓

我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

我原名曾庆冠，祖籍是湖北省黄陂县。1922年3月5日在汉口出生。

我的祖父曾梁府原在家乡种田。因生活难以维持，和祖母来到武汉。当过苦力，做过菜贩，摆过烟摊。后来经济情况稍好，开了一间小百货店。他们有三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我的父亲曾觉先是长子。我的两个叔叔在私塾读了几年书。只有我父亲热衷学习，而且由于祖母的偏爱，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，一直到大学毕业。我的母亲姓段，出身于农家，很早就由媒妁之言与父亲订了亲。她嫁过来时，父亲正在大学念书。那正是“五四”运动时期，父亲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，对于这种包办婚姻不满。大约在我4岁时，父亲遗弃了母亲，离开了祖父，在汉口另外成了家。以后，父亲和母亲终生再也没有见过面。那时我的母亲还不到25岁。

母亲带着我与祖父、祖母共同生活。由于父亲的出走，祖父、祖母对母亲有一种歉疚的心情，对待她比对待另外两个儿媳要多一些照顾。母亲意识到自己的处境，而她是极好强的，一言一行都非

常注意，几乎很少走出大门。我不记得她到过戏院和电影院。她和两个婢娘轮流做饭、洗衣，或低着头静静地坐在窗前做针线活。在这座繁嚣的大城市中，她的天地只是污黑的厨房和破旧的小楼。她惟一的消遣就是一字一字低声地念着《珍珠塔》一类的弹词书。母亲没有上过学，不知道是在怎样的情况下，依靠自学，能够认识一点字，那些古老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显然深深地感动了她。有时候，我听到她低低地哼唱了起来，声调是那样的悲凉。而且，我幼稚而敏感的心，从母亲的某些话语和某些小事细节中，感到母亲在那样的处境中，对父亲还是有着感情，有着眷恋……

我是母亲惟一的安慰和希望。她对我挚爱而又管教严厉，有时我犯了过失，母亲半夜将我摇醒，一面教训一面打我。然而，流泪的不是倔犟的我，而是母亲自己。她说：“娘是苦命人，只指望你成人争一口气，而你……”母亲是在封建阴影笼罩下的众多不幸的中国妇女中的一个，我一直不清楚她的名字，也不知道她是否有正式的名字。

我朦胧地感受到母亲不幸的命运，在我稚弱的心灵上投下了阴影。少年时，我是贪玩、调皮的。但有时候，在我内心的一角，又感到难过和凄凉。这当然也与我缺乏父爱有关。我对父亲是有着不满，甚至敌对情绪的，很少去他的新家，去了也感到拘束和陌生，有如一个生客。

我6岁时进入汉口市六小学。祖父、祖母和母亲对我希望很大，要我好好读书，以能光宗耀祖。母亲当然更是渴望我能为她带来幸福的晚年。但是，他们都无力辅导我。我上课时不用心听讲。放学回来后，潦潦草草赶完作业，就跑上大街玩耍了，所以学习成绩不佳。父亲为我订阅了《小朋友》、《儿童世界》，到读到高小时，又改订了《中学生》、《新少年》。这些杂志引起了我的阅读的兴趣。在我高小毕业前的一个暑假，学校办了一个补习班。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位原来教我们美术的年轻的刘老师。他不仅仅教我们课文，还

为我们选择了一些课外教材，如鲁迅的《故乡》、有岛武郎的《与幼小者》、安徒生的《卖火柴的女孩》、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等，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子，看到了美丽的文艺园地，而且扩大了对生活的认识。那些抒情性很强的作品感染着我，使我初次体验到艺术的魅力。在刘老师的指引和帮助下，我在汉口《新民报》的儿童副刊《小国民》上，发表了几篇习作，开始引起我对写作的兴趣。

1934年秋，我进入汉口市一男中，狂热地喜爱上了小足球，立志当一名运动员。同时，也还热衷于文艺，胡乱地阅读文艺书刊，有进步的，也有不那么与时代合拍的。是当时正在兴起的救亡运动的浪潮给了我影响；在文艺领域中，是以鲁迅为代表的“五四”战斗传统给了我影响，使我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，没有向病态的泥坑倾滑下去。

而当时使我的思想和文艺倾向受到影响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：我结识了几个高我两年级的同学熊家凤、朱文尧、蒋文高，通过他们结识了几个校外的学生。我加入了他们组成的读书会。这个读书会每个周末聚会一次（平时我们也常分别在一起），规定每人交出一篇文艺习作，在会上朗读、讨论。我们认识汉口《时代日报》的负责人，有较好的作品可以在那副刊《时代前》上发表。当时我读过臧克家的两本诗集《烙印》、《罪恶的黑手》，还读过戴望舒、卞之琳、何其芳等人的诗。主要是在臧克家的影响下，我写出了第一首诗。当我羞怯地将它在读书会上交出时，没有得到好评，但受到了鼓励。第二次我交出一首题名《生活》的诗，终于在《时代前》上发表了。诗是这样的：

忧郁像一只小虫，
静静地蹲在我的心峰。
不愿说也不愿笑，
脸上挂着一片生之烦恼。

生活像一只小船，
航行在漫长的黑河。
没有桨也没有舵，
命运贴着大的漩涡。

一个 14 岁的少年，还没有真正走向生活，对将来有无数幻想，却写出这样低沉的语句来。这里有一点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意味。但是，母亲的命运，一些我所看到的社会黑暗现象，在我的心灵上也留下了一些阴影。

无论如何，我是从这里开始了我的文艺道路。在这以后，我提高了写作兴趣，又写过一些诗和散文，后来主要是转向杂文了。这是由于鲁迅的影响。

可以说，也是从这里开始了我的生活道路。读书会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，它主要是靠友谊和意志相投结合起来的。人数不确定，成为核心的是五六个人，多的时候到十多人。这是一群自命为进步的青少年，不仅阅读一些进步的文艺书刊，还硬啃着《新哲学大纲》、《政治经济学教程》一类厚厚的社科书籍。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正从北方向全国开展。1935 年冬发生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我们中的几个核心人物参与了武汉市救亡活动的组织工作。我们这一群学生大都投入到这一浪潮中，而且是武汉市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”的第一批成员，其中包括我。我所结识的这一群友人和我参加的这一段活动，对我以后的道路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。应该说我是有着一个较好的起点——在这个起点上，曾生长过一代革命者。后来无论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面，我都没有背离开始的方向，虽然我走得很艰难。

“西安事变”后，国共两党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。被国民政府关押的共产党员和政治犯，有不少被释放。而 1937 年春，我们读

书会的三个成员熊家凤等，却被国民党逮捕。武汉有名的特务阎夏扬认识我父亲，要父亲加强对我的管教，否则也危险。那一年的暑假，我被市一中“默退”。祖父说我是被一些朋友“带坏”了，要我远离他们，送我到黄冈县仓子埠正源中学去继续念书。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，古老的中国变得年轻而英勇，我所在的那个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那种闲适和沉寂，到处可见红红绿绿宣传抗战的标语，到处震荡着雄壮的歌声，小街上常常走过举着救亡团体旗帜的队伍，有本地的，大多是从武汉来的……我们学校也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，我是其中的积极分子。1938年3月，通过到该地开辟工作的地下党员夏邦华和小陈（我已记不清他的名字）的介绍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38年7月，我初中毕业。武汉情势危急。父亲一家已去四川泸州，祖父则准备带着祖母、母亲和叔叔、婶婶逃难到广西。祖父说，为了便于我继续升学，让我到四川去找父亲，我怀着痛苦的心情离开武汉，离开祖父、祖母，离开母亲，独自登上拥挤的西上的轮船，到了四川泸州。见到父亲后，又转到重庆，进了位于化龙桥的复旦中学高中。我和同学们组成了“吼声剧团”。这个剧团的负责人程迪和是著名导演应云卫的妻弟，因而应云卫经常给我们以指导和支持。一年后，我们又另成立了“复活社”。这是一个更为庞大的学生组织，下设剧团、歌咏队等，还有篮球队、排球队、足球队，团结了不少同学。这个学生组织的核心，是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地下党员。当时王大化正在学校担任音乐教员，他负责领导我们党支部。“复活社”的活动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。他还参加过我们的话剧演出。由于他当时已是有名的进步的木刻家，又和我们的关系密切，受到学校的注意，一年后被辞退。不久，他去了延安。我们从《新华日报》的报导中知道，在延安，他积极推动了秧歌剧的活动，是《兄妹开荒》的主角。

到重庆后，我广泛阅读文艺书刊，但很少写作，更没有想到投

稿。我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向一些知名的报刊投稿的水平。

1939年的元月，因为送一个同班的同学去延安，我情不自禁地写出一首小诗《别》，带着试一试的心情，投寄到重庆《国民公报》的文艺副刊《文群》，编者是在复旦大学任教的章靳以先生。没有想到很快就刊登了出来。这真是使我狂喜。我又寄了几首诗去，也都陆续发表。而且，《别》引起了重庆《大公报》一位编辑谢贻徵的注意。他写了一篇谈抗战时期诗歌的文章，发表在《大公报》的副刊《战线》上，其中引用了《别》，说了一些溢美之辞。这样，就将我写诗的热情引向了一个高潮。如果不是偶然写出了《别》，而且得到了发表的机会，我走向文坛的时间就将推迟一些，甚至也许终于不会走向文坛。

我成了《文群》经常的投稿者，也在别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。我也热衷于读别人的诗。有一天，在重庆生活书店买到了艾青的《北方》，那是一本薄薄的64开的小册子，只收了9首诗，却给予我很大的感动，而且在诗的艺术性方面，给予了我新的启示。

在复旦中学念了三个学期，因为在校内比较活跃，在外面发表了一些作品，又不太隐蔽自己的思想，所以一直受到学校当局，特别是训育主任的注意。读到高中二年级上学期时，我关起了教室的门，揍过一个叫但家瑞的军统特务学生（此人后来进了复旦大学，曾殴打过洪深教授），因为他经常向训育主任打我们的小报告。训育主任当即要开除我。但校长认为冷处理比较合适，改为读完那一学期后“默退”。同时“默退”的还有“复活社”的社长廖临川。他是学校地下党的支部书记，我是宣传委员。

我一时无路可走，就进了在重庆南岸的东方中学。这所中学是从南京迁来的，校舍简陋，教员素质不高，所以声名不大好，有“吊儿郎当，进东方”的说法。校内政治情况比复旦中学更复杂，除三青团外，军统、中统特务学生都有。也有我们地下党的支部。我进校后，和几个志趣相近的同学组织了剧团、歌咏队。除演出过

一些小型话剧，唱过一些救亡歌曲外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演出过《黄河大合唱》。那时，这部大合唱从延安流传到重庆不久。我们的音乐水平有限，也没有乐器伴奏，但表演者热情很高，演出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，却遭到了学校的批评。我又成为校方和特务学生注意的人物。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，我不得不离校到重庆郊区冷水场一个友人家暂避了一段时期，后来总算在学校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。

这里，我必须着重谈一谈“诗垦地社”。

1940年的夏天，我还在东方中学念书。放了暑假，住宿的同学都回家了，学校食堂停办。我不愿去泸州父亲的家，生活无着。有一个朋友告诉我，湖北籍的诗人邹荻帆和我原来在汉口认识的田一文住在北碚黄桷镇，叫我去找他们。邹荻帆当时已是有一些名气的诗人了，能够认识他我是很高兴的。我身上仅有一点为数不多的钱，不够买一张到北碚的船票。也出于一种浪漫的情绪，我决心沿着嘉陵江步行去。顶着烈日，太热了就跳到江中游水。当天走了60里，到了土碛镇，已疲累不堪，就找到了在当地求精中学读书的一个过去的同学朱朝升，在他宿舍里挤住了一夜。第二天蒙蒙亮，他送我去搭木船，当天早晨到了北碚黄桷镇，找到了邹荻帆、田一文的住处。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。荻帆是诚恳、质朴、热情的；我们一见面就成为亲密的朋友，他给过我许多帮助和温暖，在诗的道路上，则携着我的手前行。他当时离开战地来到北碚是准备投考在那里的复旦大学。那年秋季他就考取了。

1941年的夏天，我高中毕业后，报考复旦大学，但没有录取。经荻帆的努力，托人介绍在复旦大学校友服务部当了一名小职员。当时冀沅、绿原考取了复旦大学。由荻帆倡议，我们几个人加上早已在校的姚奔、张小悻等，共同成立了“诗垦地社”，通过募捐，筹集到了一点经费，创办了《诗垦地丛刊》。当时正是皖南事变以后，重庆、桂林等地的进步刊物大都被迫停刊。所以这个小小的诗